

中国高校百部优秀社科专著文库

明清回回理学
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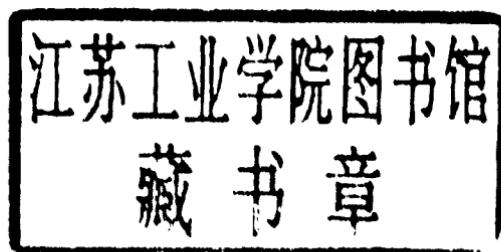
儒家思想关系研究

孙振玉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 思想关系研究

孙振玉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 / 孙振玉 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2

ISBN 7 - 5034 - 1612 - 2

I. 明… II. 孙… III. 回回理学—儒家思想—研究—文集
IV. 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536 号

责任编辑：刘 剑

封面设计：张玉霞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100811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10113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5.5 字数：132 千字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150.00 元 (本册定价：15.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明清回回理学的兴起背景及其性质 | | (1) |
| 一、明清之际回回民族的兴起和觉醒 | | (2) |
| 二、明清之际的回教变迁 | | (6) |
| 三、明清之际的回回理学与回儒 | | (12) |
| 四、明清回回理学的性质 | | (21) |
| 第二章 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 | (26) |
| 一、为什么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 | | (26) |
| 二、本体论上的批判 | | (29) |
| 三、人性论上的批判 | | (35) |
| 四、认识论上的批判 | | (40) |
| 五、道德论上的批判 | | (45) |
| 第三章 造物论上的吸收 | | (50) |
| 一、回回理学的天范畴 | | (51) |
| 二、回回理学的无极太极说 | | (52) |
| 三、回回理学的动静说 | | (57) |
| 四、回回理学的阴阳说 | | (59) |
| 第四章 本体论上的吸收 | | (66) |
| 一、回回理学的理气说 | | (67) |
| 二、回回理学的心物说 | | (71) |
| 三、回回理学的道器说 | | (76) |

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

| | | |
|---------------------------------|-------|---------|
| 第五章 人性论上的吸收 | | (81) |
| 一、回回理学的性即理说 | | (82) |
| 二、回回理学的天命之性说 | | (86) |
| 三、回回理学的气质之性说 | | (90) |
| 第六章 认识论上的吸收 | | (95) |
| 一、回回理学的心具理说 | | (96) |
| 二、回回理学的致良知说 | | (101) |
| 三、回回理学的持敬、克己说 | | (104) |
| 四、回回理学的诚明说 | | (109) |
| 第七章 道德论上的吸收 | | (113) |
| 一、回回理学的天道人道说 | | (114) |
| 二、回回理学的天理人欲说 | | (120) |
| 三、回回理学的成己成物说 | | (124) |
| 四、回回理学的君子小人说 | | (128) |
| 第八章 批判与吸收的特点 | | (133) |
| 第九章 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的特点及启示 | | |
| | | (147) |
| 一、特点 | | (148) |
| 二、启示 | | (155) |
| 后记 | | (162) |

第一章 明清回回理学的兴起 背景及其性质

从明朝后期开始，一直到清末，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在我国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化思想界，有一批回回被称做“译著家”者，异军突起。所谓“译著”，是指我国前所未有的—种学术形式，顾名思义，“译著”即翻译著述也。翻译是将伊斯兰教的经典或经院哲学（神学）作品翻译成汉文；著述则是在进一步吸收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著书立说。这一学贯东西，糅合伊、儒两家的民族文化创造活动，催生了一种新型的伊斯兰文化回回伊斯兰文化，也在明清之际创生了另一个理学体系回回理学，同时，亦锤炼了一批著名的译著家（或曰回回理学家），王岱舆、刘智和马德新是其中公认最有成就者。

他们三人在明清回回理学译著运动中的突出作用和贡献表现在：王岱舆是这一运动的开拓者，是他创造性地探索了译著的目的、任务、内容、形式和道路；刘智进而使其规范化、精致化，使其更富思辨性质；马德新则予以拾遗补漏，整理出新，为推动运动的后期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做出过很大贡献。

明清回回理学译著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伊斯兰教，但是，它却以最有效的方式，如“以儒诠经”“援儒入回”“附儒以行”等具体方式，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推动了历史上的回、儒对话，从而推动了回回这个移民群体对我国的适应。明

清回回理学译著运动的实质则在于它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创新运动，正是通过这一运动，广大回回才更加有机地融入到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祖国大家庭之中。至于这一运动之长期而富于成果的发展，则离不开它的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一、明清之际回回民族的兴起和觉醒

我国与古代阿拉伯和波斯地区很早就有往来，到汉代，已达到空前规模，著名的“丝绸之路”这一国际大通道就是其历史见证。“丝绸之路”在沿途各国、各地区、各族人民之间，发挥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流等多种重要功能，因此，伊斯兰教诞生后，通过这一通道而来华并定居的穆斯林移民中，在唐宋时期就拥有使者、商人、士兵等多种身份。而这些穆斯林移民，就是我国回族最早的来源。

从被称作“蕃客”这一名称上看，唐宋时期在华的穆斯林移民的主体应是商人，其分布状况，也大体上以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如唐代的长安和北宋的开封，以及海陆交通方便的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城市为主。由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他们于所在之地，一开始就呈聚居方式，并在所谓的“蕃坊”内实行自治式的内部管理。“中国商埠为亚拉伯商麇集者，曰康府（广州）。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① 他们的在华子女可以

^① 此段引文出自唐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写的一篇游记。（刘凤五：“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李兴华，冯今源主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册，第99页）

第一章 明清回回理学的兴起背景及其性质

随所在地入学，亦有我国政府为之专门开办的“番学”。^①“蕃坊”“蕃学”的出现，是穆斯林长期留居我国的重要表征。

蒙古帝国兴起后，曾征服中亚大片伊斯兰土地，掀起过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致使大批穆斯林进入蒙古人统治的东方。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继而灭南宋而统治全中国；1275年，旭烈兀占领巴格达，灭阿拉伯帝国，至此，昔日两个庞大的帝国唐宋时期的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全部接受了蒙古贵族的统治。正是伴随着这一政治扩张，以及后来继续迁徙与发展的结果，元代穆斯林的分布更加遍及中国，江南和西北一带尤多。^②

蒙元^③时期的穆斯林，在我国被称作“回回”，这是今日回族名称的来源。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回、汉的社会地位已不同于唐宋时期，这时，回回作为“色目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虽低于蒙古人但却高于汉人的待遇。“惟我皇元，肇基龙朔，创业垂统之际，西域与有劳也。洎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丘之义乎？”（王礼麟：《原集·义塚记》，卷六）回回之在华者，可以求学、入仕、经商、务农、成家立业，自然不复思归了，这一段话就是这样一番情景的写照。

蒙元是我国回族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回族

① 龚明之《学海类编本》载：“……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吴中纪闻》，卷三）又：蔡绦《知不足斋丛书》载：“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7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建番学。”（《铁围山丛谈》，卷二）

②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载：“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明史 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

③ 指蒙古帝国和元朝两个蒙古政权时期。

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

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华之“回回”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回回中已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各种突厥人、其他中亚人等多种成分，后来，随着元明时期大批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他们也成了今天我国回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不过，在所有这些来源中，却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

明代，汉人政权失而复得，回汉之间的关系亦发生了新的变化，它既不同于唐宋时期的侨民与所在国之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元代之具有等级差别和歧视的族别关系，而是变成了同为一国之臣民但却在政治上有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区别的这样一种关系。这一关系至清代又有所变化，那时，广大回回所面对的乃是满、汉贵族联合政权的剥削和压迫。中华民国倡导“五族共和”，这是回、汉两族关系向正常发展之始；新中国成立后，回、汉人民才愈来愈朝着缔造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的方向发展。

明代，新疆和中亚一带仍在蒙古势力的控制之下，他们的存在对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曾起到过重要影响。总的来看，明代中叶以前，中原王朝基本上还维持着较长时期的对外开放局面，这时，中亚等地穆斯林得以继续以使者、商人、传教士等身分来华，而使回回这一穆斯林群体能够不断获得补充。但是，明代中叶以后，却因新疆局面失控而在西北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从此，基本上关闭了历史上大批穆斯林来华的大门。因为，与此同时，阿拉伯等国穆斯林由海路来华之可能性，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海上霸权，以及中国政府的全面闭关锁国政策的极大阻碍。这一重要变故，促使回回对自己在华之身分与处境不得不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加速了其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化、本土化进程。

明代是我国回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她的中国化、本土化特征才逐步形成并稳定下来。明

第一章 明清回回理学的兴起背景及其性质

初，汉人重新夺得政权后，所要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改“胡俗”为“中国之制”。《明太祖实录》卷 26 载：“（洪武元年二月壬午）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中国之制，……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这一措施显然并不是针对回回等胡人，而应是针对变为胡人的汉人而来的，可是，明初回回人改姓氏却一度蔚然成风。^①今天，回族人在语言、姓氏、服饰等方面与汉人已无太大区别，溯其所自，明代不谓不是其重要契机。明代回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风俗习惯方面，还体现在血缘方面，并与明朝政府的同化政策有一定关系，如《明律》卷 6 载：“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回汉通婚并不始于明代，汉人作为当今回族的一个重要来源亦属事实，但推行血缘同化政策，明代却是一典型，其对当今回族人体貌特征的影响不能说毫无干系。

风俗习惯与体貌特征上的改变，还只是更深层变化的前奏，始自明朝末年的经堂教育与回回理学译著的意义更大。经堂教育是我国回族特有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它由陕西回回胡登洲（1522—1597）首创，有广大群众长期支持，至今仍在起着传播民族文化知识、培养民族、宗教人才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回回理学译著运动就是在经堂教育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而所有著

^① 洪武三年四月甲子诏曰：“此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民族之道，中书时告谕之，如已更易听其改正。”（《明太祖实录》，卷 26）不过，改姓之风似并未被制止，如，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海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正言：“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日知录》）

名理学译著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出自这一教育。回回理学译著，不仅是用汉语言、文字来从事伊斯兰文化之翻译著述（但这也足以证明，汉语已由回回的民间语言，发展为学术语言），更主要是从思维上、从认识上、即从理论和方法上，甚至从民族文化气质与精神上，全面地接受了汉族儒家的影响。这一深刻变化，是广大回回认真反省自己新的生存发展环境，认真反省自己新的本土身分，再创自己新的主体性的必然结果，亦是以“伊斯兰”为原有特色的回回文化之中国化、本土化的结果，它因此标志着回回这个民族共同体在我国的新的兴起，以及她的民族意识的新的觉醒。

清代，回回的民族意识，在反清斗争中变得愈来愈强烈。与所有其他土生土长的民族不同，我国回回这个原本是外来的民族，其民族意识中，就特别地包含着中国本土意识。在近代，回回的觉醒，亦与中华民族之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致的。

二、明清之际的回教变迁

我国历史上曾以“回回”名教，把伊斯兰教称作“回教”，这一名称虽不专门指回族伊斯兰教而言，但不妨碍本文将其限定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众所周知，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至为密切，回族文化的核心是伊斯兰文化，明清之际的回回理学译著也是伊斯兰文化译著，所以，考察伊斯兰教自其传入至明清之际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我们这里的主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由于与古代阿拉伯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关系，伊斯兰教

第一章 明清回回理学的兴起背景及其性质

在其创传不久，我国就通过两地使者了解了有关消息。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卷三记载，穆罕默德为圣二年（610）和迁都十一年（633）都曾接见过我国使者，并两度派遣其族弟斡歌士随使者来华。^① 唐宋时期，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不断来华并留居下来，他们随地建寺，坚持过宗教生活，由是伊斯兰教也愈来愈为国人所知晓。

伊斯兰教之在我国正式扎下根来，应该是蒙元时期，这与我国回族直接来源于该时期的回回移民是一致的。蒙元时期来华的回回移民，类似于一种社会大搬迁，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其中包括大量的宗教人士，正是他们成了广大回回移民在华坚持其宗教生活，伊斯兰教在华畅行其道的基本支撑力量，这种局面大概一直维持到明朝后期。

伊斯兰教之所以能顺利地在华扎下根来，除有广大回回这个重要载体外，它也得利于蒙元时期较宽容的宗教环境，以及明代统治者与伊斯兰教的特殊结缘关系。众所周知，蒙古帝国和元朝政府实行的是一种与其民族、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相一致的宗教宽容政策，不仅如此，它还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分类管理，如针对伊斯兰教就设立过“回回哈的司”“回回掌教哈的所”等管理机构，其任务无非是使宗教人士如“哈的”和“掌教”等得以正常行使其职能，使广大回回的伊斯兰宗教生活得以正常进行。这些机构的设立，是伊斯兰教在华正式开始扎下根来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朝皇帝中，太祖朱元璋（1368—1398）和武宗朱厚照（1506—1521）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是颇耐人寻味的。朱元璋曾

^① 按：为圣二年的使者，不一定是因穆罕默德而派遣，但与之有过接触，了解到伊斯兰教的创传情况是完全可能的，斡歌士两度来华，民间传说已久，且有历史遗迹佐证，不可轻易否定。

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

御书“百字赞”，^①显示了他对伊斯兰教的熟知程度，表达了他对伊斯兰教的“褒扬”，严然如一位穆斯林。武宗朱厚照也同样对伊斯兰教大加推崇，曾作诗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武宗还曾下令在民间禁食猪肉。^②总之，各种迹象表明，伊斯兰教的影响曾扩大到明朝君臣、甚至宫廷之中，似是不争的事实。^③此外，明朝政府还仿效元代的做法，将伊斯兰宗教活动纳入国家的有效管理之下，如对宗教人士实行审查、发放行教凭证（称“札副”）制度，甚至还给以“冠带”，以示优渥。

明代，回回启动了全面的中国化、本土化进程，这在极大的程度上就体现在回回伊斯兰教的变化之中，尽管这一变化较之语言、风俗习惯等的变化可能要迟。中国化、本土化是明代以后回

^① 疑此“百字赞”仅为“御书”，即由某宗教人士拟好后，再由朱元璋书写，其文曰：“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

^② 武宗对伊斯兰教还有评论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余振贵点校，[明]王岱舆：《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群书集考”）另外，关于武宗禁食猪肉之事，考据殊多，此仅举二例：[清]傅维麟《明书 武帝本纪》载：“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间畜猪，著为令。”又：《皇明实录 武宗实录》卷182载：“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

^③ 众所周知，明朝在其建立过程中，曾得到过常遇春、胡大海、沐英等著名回回将领的大力支持，明代甚至流传有“十大回回保国”之佳话，还有，因“七下西洋”而闻名的太监郑和本人就是一位云南回回。

第一章 明清回回理学的兴起背景及其性质

回伊斯兰教变化的基本方向，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在密切相关的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其一，思想理论上最体现这一基本方向的是把“以儒诠经”作为其主要手段的回回理学译著；其二，宗教实践上最体现这一基本方向的是我国本土教派“西道堂”、伊赫瓦尼等的创建¹⁷，其三，经堂教育的兴起，不仅其本身具有本土化特征，还直接推动了回回理学译著的发展；其四，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思想和组织的传入，不仅产生了本土化的门宦教派，还为回回理学译著糅合儒家思想提供了神秘主义的理论结合点，并以其把“人主合一”作为最高认识（“认主”）境界的宗教功修，为之提供了实践方面的论证与诠释。

以上所述重要变化又以明代后期以来回回伊斯兰教的发展出现了严重困境为契机。这一困境既有普遍性、一般性的时代特征，也有特殊性、个别性的本土特征。伊斯兰教是中世纪早期的产物，嗣后，它为适应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身，著名的神学家安萨里（卒于 1111 年）曾把苏非主义纳入伊斯兰“正统”教义之中，为渐趋僵化的伊斯兰教注入了发展的活力，与此同时，苏非主义教派受其推动，约从 13 世纪开始，在伊斯兰教的发展中愈来愈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它也愈来愈脱离伊斯兰教的早期教义传统，尤其是苏非主义的圣徒、圣墓崇拜，更有悖于伊斯兰教的唯一神信仰的原则。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以后，正当欧美资本主义日益发展之际，明清之际的中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与唐宋之际的中国和阿拉伯帝国曾一度共同代表世界的繁荣正好相反，又同样经历着不可避免的衰落，以及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危险之中，古老的封建秩序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兰世界在近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复古主义的，以兴起于 18 世纪的瓦哈比运动为代表；另一个是改革主义的，即在坚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下，要求进行社会改革，这以兴起于 19 世纪的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

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

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思潮，以及有关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为代表。

虽然回回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或完全中断过与外面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或接受其影响，但是，自从明清之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国际上伊斯兰教的变化并未立即或没有在我国回回中得到响应。苏非主义思想大概是在明朝后期才传入我国回回之中，至于门宦教派的产生则是在清初以后，所以，当瓦哈比运动大力反对苏非主义的时候，门宦教派在我国才刚刚兴起，而接受瓦哈比主义影响的伊赫瓦尼教派直到清末才出现，至于以倡导新式教育、振兴民族为主要目标的回回近代文化运动则是在20世纪初才广泛开展起来。

所以，明清之际，回回伊斯兰教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乃有自己的特点。最首要的是因语言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穆斯林信仰的淡化。到明代后期回回理学译著出现前夕，汉语已取代阿拉伯语、波斯语而成为回回普遍使用的语言，当为不争的事实，这无疑为非专门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普通回回群众甚至学者阅读、理解，或在他们中传播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形成了极大的语言障碍，长此以往，这势必会导致他们信仰的淡化。明朝末年广州某清真寺在为重刻《正教真诠》所作“序”中就讲道：“惟是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识经者必不能通汉文，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故开卷了然，渝(yuè)我心源，发人聋聩。”（王岱舆：《正教真诠》）语言障碍已造成“习经者”与“习汉文者”即念经者与读书者两相隔阂，因此，以汉语来表达伊斯兰教深邃的道理势在必行。清代著名经师赵灿也讲道：“初，吾教自唐迄明，虽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传，旨义难悉，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教，以致多人沦落迷途，漫漫长夜而甘醉梦之不觉也。”（杨永昌，马继祖标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第一章 明清回回理学的兴起背景及其性质

年，第1页）由语言不通，导致专门宗教人才匮乏，其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其次，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回回与儒家人士之间不仅难以实现对话，还使信仰伊斯兰教的广大回回虽长期处在汉人之间却难以融入以汉人为主的主流社会，这是一种很尴尬的处境。如前引文章所表明的那样，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由于其经典都是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再加上回回对外不传教，这就使得伊斯兰教义很难为儒家学者所窥知，这就难免导致后者视回回信仰为“殊风异俗”，而令他们长期处于被误解之中而难于融入汉人主流社会。其实，回回与儒家人士之间并不是没有沟通的基础和可能，某儒名何汉（敬）者，在为王岱舆的《正教真诠》作“叙”时就讲道：“……清真之教大衍于中幅矣。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且立说平易，不事玄诞，与道释两家，绝为霄壤，较之吾儒性理一书，同而异，异而同，亦在所不讳。其兰台石室之藏，浩足充栋，但俱国音，中幅之人，无一晓者。”沟通亦不难，惜乎在王岱舆等人之前，无汉文经典可读，所以，汉文译著事在必行。

还有，明清之际正是回回伊斯兰教教派多元化、思想多元化时期，亦是其教派斗争、思想斗争最激烈时期，这对正在兴起的回回这个群体是相当有害的。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一个教派、教义并不统一的复杂的宗教体系，不过，由于回回是在穆斯林移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特殊背景，从唐宋一直到明代，他们在我国曾长期忽视教派分歧，相互之间一直也相安无事，只是后来，随着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及其组织传入之后，教派、教义分歧与斗争才愈来愈激烈。这一分歧和斗争，不仅严重地伤害了回回内部的团结，还导致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抗与后者的残酷镇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过血的教训。明清之际，国外伊斯兰教所谓“正统”与“异端”的斗争也第一次在回回群众中表现了出来，译著

家如王岱舆、马德新等也都以著书立说的形式参加了这一斗争，而这也是他们之从事译著活动的一个目的之所在。他们当然都以“正统”自居，以正“本”清“源”为己任，而对“异端”进行批判。王岱舆和马德新的批判都是为了捍卫伊斯兰教的最高信仰，即对造物之真主的信仰，但也有区别，王岱舆是站在苏非主义立场上进行批判的，马德新则把苏非主义对教主（“晒以核”）的崇拜当作批判的靶子。（王岱舆：《正教真诠 易真》；马德新：《四典要会 正异考述》）值得注意的是，赵灿还告诉我们，当时，造成回回内部宗教思想混乱的来源之一，就是信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波斯（“法尔西”），而且，思想分歧最严重的地区，也正是教派斗争最激烈的西北一带。（赵灿：《经学系传谱》）

三、明清之际的回回理学与回儒

宋明之际，我国理学昌盛，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独霸学坛，至清代，尽管学术上迎来了走出理学的趋势，但这一学术思想作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影响却一如既往。明代后期以来，随着回回民族在我国的全面形成，她的一个后来被称作“回儒”的知识群体，也开始用汉语著书立说（这是历史上回回民族接受汉语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创造出了一个揉和伊、儒两家的学术思想体系（这是历史上回回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而且，种种证据表明，他们当时还接受了“理学”这一学术名称，用来指称自己创立的这个新的学说体系。

根据清代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的记载，约在明末清初之际，回回经师中流传着3部外来伊斯兰经典，名曰《米而撒德》、